

烏家培文庫



第二冊 經濟數量分析概論 (1978-1981)



中國計劃出版社



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资助项目

乌家培文库

第二册

经济数量分析概论

(1978—1981)

中国计划出版社

自序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成立30周年，也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成立20周年，值此喜庆时节，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谢康教授来北京时，向我建议编辑出版《乌家培全集》。我当即反问，有这个需要吗？并说，20多年前，国内出版的经济学家选集中，已有一本《乌家培选集》，再出全集有何益处，人还活着，文集能出得全嘛！但谢康的建议却引发了我的一番思想考量。

我就这个问题同我的夫人傅德惠商量。她认为，回过头去审视一下自己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把以往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不能温故创新，至少也可以温故知新，还可以反映研究活动过程的梗概。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反过来跟她商量，说我几乎丧失了视力，能写不能看，而她听力差、视力特好，我需要她的帮助和配合，问她能否帮我一把，她欣然同意了。

这时我想起参照数据库、信息库、知识库的提法，决定采用《乌家培书文库》这一名称，有一次偶然同我的好友《中国剪报》总编王荣泰谈起时，他说用“文库”比用“书文库”更简洁明了，且书也是由文组合而成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下定决心，启动编纂《乌家培文库》这项工程。

从1959年至2008年，整整50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要把这么长时期内所写的散见各处的文稿收集起来，并非易事。特别是过去发表的文章，往往为多种报刊采用且以不同标题与不同编排方式出现，甚至还被收入到多种书籍中去。我只好把所著的书一本本排列起来，把每年的成果一捆捆堆起来，以时间顺序为经，以逻辑联系为纬，进行“同类项合并”。幸好对前面数十年的文稿，我已经辑录过几本书，如《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信息与经济》等等，而近10年的文稿均保存在计算机U盘内，容易查找。

在傅德惠的帮助下，经过较多时日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整个文库的编纂工作。我把文库分成十册，第一册为《经济数学方法研究》（1959—1977），第二册为《经济数量分析概论》（1978—1981），第三册为《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1982—1983），第四册为《经济及其研究的数量化与信息化》（1984—1986），第五册为《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1987—1991），第六册为《经济、信息、信息化》（1992—1995），第七册为《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1996—1998），第八册为《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1999—2001），第九册为《信息经济学与信息管理》（2002—2003），第十册为《与时俱进的经济学与管理学》（2004—2008）。每一册都有一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有一本书或者一篇统领文章作支柱，并辅以相应有联系的其他文章，或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至于每一册时期的划分是大概的，特别是两册之交分年就较为模糊，因为需要照顾到每一册篇幅的大小基本相当，大致在20万至40万字之间，个别分册略有起落，可能会厚些，也可能薄一些。

每册都有导读，不仅说明所收入书文的梗概与排列的依据，以及一些重要文稿写作的缘由，而且描绘每个时期学术活动的背

景，为不宜收入文库但又有重要意义的相关背景提供线索。各册之间的导读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时间上也是相互连贯的。

根据统计，收入整个文库的有 9 本书，除书之外还有 177 篇文章，以及 2 个附录，附录中有 18 篇文章。

收入文库的文稿绝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独立写作的，只有 21 篇是与他人合写的，他们多为我的学生、助手或秘书。我要借此机会，向他们的支持与合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收入本文库的文稿绝大部分是过去发表过的，但还有 22 篇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其中有的是向领导的汇报，有的是国际会议上的演讲，而有些只在内刊上用过，这些情况在每册的导读中都有所说明。

我的专业是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这两个经济学分支学科都同管理和管理学有密切联系，因此我的研究涉及管理学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加上社会联系多，自告奋勇的写作，或应邀而作的“客串”文章时有出现，希望读者也能喜爱。

我于 1979 年创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在 1989 年又创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但我在数量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方面，在我国仅仅是个先行者而已，能做这两个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块垫脚石，为后起之秀探路和开道，则是我莫大的欣慰。

生命不息，学习不停，探索不止。我已年近八旬，但学习和研究仍是我最大的兴趣，我愿意在有生之年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回报培养和哺育过我的祖国和人民，为复兴中华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乌家培

2009 年 10 月 1 日

导 读

文化大革命前，经济研究所与各单位一样，政治运动多，各种会议也多，几乎没有整段时间可做系统研究，为利用零星片断时间，我曾大搞俄文翻译，有个人独译，也有与人合译，且由我统校。出版成书的如《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利用效果的确定问题》（财政出版社1958年版）、《财政理论问题》（财政出版社1958年版）、《苏联经济核算问题论文集》（编译，财政出版社1959年版）、《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速度与比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以及《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1981年再版）等。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本书稿译于文革前，经文革十年动乱失而复得，由于该书是苏联涅姆钦诺夫院士遗作，为数量经济学的“史前”名著，特送商务印书馆付梓，使之问世。

经济研究所全体人员在水革期间有两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逐步恢复工作。我先后负责科研处、计划经济组，带领部分同事，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编写《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的讲稿（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学一点政治经济学》），以及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写《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讲座》。尤其是后一次播出，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各出版社竞相出版播出稿，如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光辉的文献，强大的武器——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讲座》、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论十大关系〉学习参考纲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论十大关系〉学习讲座》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我们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迸发出极大的积极性，研究成果纷纷涌现。

我收入本册的论文就是从 1978 年开始的。本册内 1978—1981 年四年的书文，在数量上并不少于上一册前 19 年的书文总和。1978—1979 年，首先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和部门联系平衡问题，这里收入了 6 篇文章，其中有向领导与社会呼吁的“应当重视‘投入产出法’的利用”一文。其次研究投资效果和经济效果问题，这里收入了 3 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所作的学术报告“关于经济效果问题”，该报告以前没有发表过。重要的是，当时应人民出版社的邀约，带领几位同事到江苏省常州市与市委宣传部合作撰写《常州工业发展道路》（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于《光明日报》、《经济研究》以及其他书籍上发表了 5 篇文章，一并收入在这里，其中“常州市‘大集体’所有制工业的调查”，在发表前曾呈送中央，引起对地方工业所有制问题的重视。此外，还有 2 篇与数量经济学有关，“什么是数量经济学”一文，因“经济数学方法”于 1979 年改名为“数量经济学”，《百科知识》总编梁从诫要我为此写科普文扩大宣传。还有一篇“要造就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为全面认识知识分子问题应《光明日报》理论部之约而写的，在当时很重要，现在也不乏意义。

1980—1981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派遣，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进修深造。先是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美国经济研究所，学习英语的听、说、读、写以及语法，达半年之久。

学习期间应《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之约，要我为出国学

者学习英语谈些体会，我写了“来美后学习讲英语的点滴体会”。该文虽非学术论文，但对国际交流学者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把它收在这里了。英语培训毕业后，我又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访问了一年半。在这段时间内，我向国内领导递交了一份内部报告“从反面学习中加深正面认识”，这是因为我在与台湾、香港同胞的交往中，获知台湾作为“四小龙”之一，在经济起飞中经济官员和经济专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尽管海峡两岸制度不同，但发展经济的规律却是相同的。此文当时颇受有关领导青睐，现在重读仍感有一定启示，故在这里首次加以公开发表。另一篇“记1981年春季林克预测会议”，虽是学术报道，但它反映我国学者首次参加这样的世界经济预测会议，且为我国后来正式加入该国际学术组织开了先河，至今，我国仍保持与林克组织紧密的学术联系，这有特殊意义，故亦收入此册。

访美结束时，我交出了两项成果。一是《经济数量分析概论》一书，该书是我出国时向到北京机场送我的马洪院长的承诺，我坚持在国外完成写作，回国前我把书稿寄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于1983年出了一版，1985年又出了一版。该书写完时，我还用英文作了详细概述，向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征求意见，他不仅作了文字修改，而且还鼓励我向国内同仁传播知识、扩大影响。我把这本书作为本册的主要内容放在这里，并以它来命名第二册。

第二项工作是，我利用留美的最后3个月时间，放弃福特基金会规定的旅游节目，到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布鲁金斯研究所、商业部经济分析局、世界银行开发政策参谋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14个进行宏观经济模型应用研究的主要单位考察，访问了美国阿罗、埃克斯坦（已故）、格里、利切斯（已

故)、安德森、阿尔蒙等 50 多位经济学家,写了一份“发展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访美调查报告”(载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 年第 77 期)。由于该报告的实质内容在我回国后立即向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所作的学术报告“关于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中已有充分反映,且曾被收入《乌家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而原报告的具体细节时过境迁,可以从略,故用后一个学术报告取代前一个调查报告,放在《经济数量分析概论》一书之前。这样“捞干的”,可以节省读者的时间。

目 录

导 读 / I

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伟大发展——学习毛主席关于

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理论的体会 / 1

向挖潜、革新、改造要速度 / 16

广泛实行专业化协作 / 20

常州市组织产品一条龙协作的经验好 / 25

经济效果与经济管理 / 38

常州市“大集体”所有制工业的调查 / 44

平衡、平衡法、平衡表 / 55

论基本折旧基金的使用构成 / 67

关于经济效果的几个问题 / 74

专业化协作是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 88

应当重视“投入产出法”的利用 / 99

谈经济控制论 / 102

关于经济效果问题 / 110

部门联系平衡的理论与方法论 / 140

II

要造就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 174

国民经济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专业化协作 / 178

什么是数量经济学 / 199

也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与张熏华同志商榷 / 206

从反面学习中加深正面认识——读台湾纪念刘大中

尹仲容两本文集感想 / 222

记 1981 年春季林克预测会议 / 234

来美后学习讲英语的点滴体会 / 242

关于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 / 245

《经济数量分析概论》 / 259

社会主义再生生产理论的伟大发展

——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轻工业和 重工业理论的体会

社会主义再生生产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生产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毛主席总结了我国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丰富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并把它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的再生生产理论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两大部类、两大部类之间的对比关系、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这三个基本原理，来阐述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关于农轻重理论的新根据和新原则是如何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再生生产理论的。

一

社会产品，从而社会生产，在实物形态上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这是马克思再生生产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它与社会产品在价值上分为 C、V 和 M 的原理相

结合,构成“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①由于确立了这两个基本前提,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创立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这一重大贡献,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奠定了基础。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很重要的。它对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实行计划经济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但是,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目的,不同于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目的,后者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一般规律性,前者就不能满足于对社会再生产的抽象的理论分析,而必须进一步具体化为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工作原则。这就要求把两大部类的划分相应地具体化。

毛主席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时,不仅采用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而且广泛地大量地采用了农轻重的划分,有时还把这两种划分统一起来了。

农轻重的划分,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生活,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复杂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毛主席赋予农轻重的划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结论。

第一,毛主席按照农轻重的划分,第一次把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当做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提出来。第一次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和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正确处理农轻重各个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这是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理论的基本思想。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页。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文献中，首次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毛主席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的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① 根据毛主席关于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指示，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规定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必须同时并举。发展国民经济要“两条腿走路”，不能只依靠调动一部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而要依靠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既要发展大型企业，也要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大工业；更不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过了很长时期，重工业才缓慢地发展起来，并使工农业互相分离，两极分化；而是工农业相结合的道路，实现马克思预言的工农业“新的更高级的综合”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工业化道路。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统一起来。”^②

第二，毛主席既重视正确处理农轻重相互之间的关系，又重视妥善安排工农业各自的内部关系，提出在农业内部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在工业内部要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

在坚持农轻重划分的同时，毛主席又把粮食生产从农业内部突出起来，提出安排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要“以粮为纲，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0页。

② 列宁：《生产宣传提纲》，《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6页。

全面发展”。他把钢铁、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等基础工业比作“屁股”，把农业和国防工业比作两个“拳头”，指出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这就打破了长期来片面强调加工工业发展的形而上学观点，使人们认识到原材料工业、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必须先行一步，不要搞“无米之炊”，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模越是不断扩大，就越需要准备好“一个先行的生产过程的生产物”。毛主席运用和发展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三，毛主席指示我们通过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正确处理农民和工人两个阶级的相互关系。

社会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出发，通过分析物质再生产过程中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的运动，来揭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把物质产品的相互关系同人们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要求我们在正确处理农轻重的相互关系中，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人民内部关系处理好。工农业的结合问题，实质上是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用削弱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必然会影响工农联盟。毛主席一贯强调农民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毛主席特别重视农业同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①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5页。

二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再生理论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产品在两大部类相互交换中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能否全部实现，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进行，主要决定于两大部类的相互交换中产品是否对路，价值是否相等，能否满足对比关系的要求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重新结合。任何一个部类发展不足或过分发展，都会使对比关系遭到破坏，从而影响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物质生产过程本身要求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协调平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不断地扰乱、破坏，使其不可能协调平衡。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正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种种矛盾和引起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说：“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①

列宁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理论，包括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列宁粉碎了认为马克思的再生理论不能用来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理论。列宁精湛地研究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引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得出了“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占优势的结论”。^②

马克思和列宁研究的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理论，不能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不能不具有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关系的形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适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5页。

②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页。

用的。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指出：“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 + M$ 和 $II C$ 的关系吗？”^① 斯大林在批评雅罗申柯的错误时也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②

毛主席把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方法、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重要指示。这是对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原理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巨大发展，也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的发展。

下面，就从对两大部类相互关系原理的运用和发展的角度，对比社会主义再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些本质特征，来分别说明毛主席提出的总方针、计划顺序和工业转轨这三个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第一，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两大部类内在联系的最完整最本质的概括。农业之所以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与农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的特点有关，因为农业所生产的基本生活资料，是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根本保证，是人们生存与一切生产一般的最先决的条件。马克思说：“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页。